

在加大；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在中国的科学共同体中已经建立。

2. 研究积累和进展 学科的中文教材体系（翻译的和自身编著的）和相关的中文参考文献正在丰富，但独立和深刻的研究著作仍然少见；政府每年有少量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资金资助，但都偏于应用和对策项目；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独立的发表园地，它们只好散见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刊物中，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学术会刊《社会心理研究》只能以内部发行；值得提及的是，一批青年学者在与港台学者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以“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和本土化为目标，尝试对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进行说明和解释，有相当的进展和影响。

3. 主要问题和概要评论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良好发展面临困难、挑战和机遇。由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制度的分裂和学术训练背景的差异，偏好实验方法的心理学学者与偏好调查访谈的社会学学者之间少有沟通，这使有限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群体的资源的合理配置遭遇障碍；作为享有学术霸权的话语，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定位渐渐产生其非预期的不良后果，这就是对国际主流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转型的忽视、漠然和无知；每年生产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虚假文本和肤浅的经验研究，使学科处于泡沫繁荣状态，无法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同时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建构和数据积累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面对中国社会空前的结构转型及其后果，社会心理学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

新世纪并不必然会亲睐中国社会心理学。在批判性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学者，惟其以宏大的社会问题及其它所隐含的现实的社会行动作为关注的视域，在充分了解和反思西方智慧的基础之上，进行脚踏实地的辛苦工作和点滴积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荣誉之门才可能慢慢洞开，与国际学者平等而有尊严的有效对话和合作才可能慢慢实现。

20 年文化研究的嬗变：从启蒙到表述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在过去 20 年里，社会学界的文化研究在对象、理论、方法诸方面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种种变化之中，我们发现文化研究的旨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我们把它概括为启蒙到表述的嬗变。大致来说，在前 10 年里，现代话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获得文化霸权的地位），人们研究中国文化的着眼点是批判中国人相对于“现状”标准的落后思想，使中国人不再封闭、保守，转向未来，追求效率。人们的信念是通过文化现代化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创造条件。克服传统的现代化，现代文化，发达国家文化。

定位于启蒙，设定自己高高在上，全知全能，懂得过去，胸怀未来，以不可质疑的现代性尺度衡量对象（符号暴力），语言模式是这种文化现象反映某种落后的属性，需要吸收某种现代属性予以改造。挑刺，找毛病，如何改掉它。如：国民性，劣根性：愚昧、封闭、狭隘、自私、窝里斗、奴性。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文化指标。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进步、优良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需要关注民众文化程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探讨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要注意高度的社会同质性与文化共识之间的关联。启蒙与发展、意识形态批判与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表述需要步调一致。吸收外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外来文化。要研究一般意



义的国家文化精英在这个过程中行为，并把社会学界内部的共识文化（文化程度，教育水平）作为研究的因素、变量之一。

自 80 年代末以来，文化研究逐步淡化了其“启蒙”的使命，不再居高临下，而是承认各种群体有其特有的文化，并帮助这些群体向社会表述其文化，促使其文化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研究者要把自己定位于表述，要求自己深入其中，以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参与观察，首要的使命是澄清这种文化现象是怎么回事，然后把它说清楚，让社会也能够理解它，最后达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共处。

要注意文化与社会分化，社会分化与文化多元这些社会现象：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这里存在着社会学者的差异以及关怀的差异：如何帮助表达、帮助沟通、帮助获得承认。在多种生活方式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问题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意味着从代表全体到代表自己。

对民间文化复兴的研究，从批判到理解。

大众文化研究，批判到辩护。

对同一对象的学术关怀的差异更能够说明从启蒙到表术的嬗变。例如有关传统研究，清除传统的现代化。以传统为基本的现代化（发展，进步）。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周 星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这二十年，同时也是中国人类不断成长的二十年。中国人类学成长的路径大体上有以下几条线索：

1. 由“民族研究”中逐渐复活并不断发展的“民族学”，大体上以中国民族学会及其活动为象征。2、伴随着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和以几个高校人类学系的建设为标志，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在内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得到强调。3、中国社会学史上存在的那个主要的“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在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再次引起部分学者重视，同时在新的学术实践活动中，该传统也有一定的新的积累。4、涉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旧著重刊工作、新近的人类学理论著术的译介工作等，促成了人类学界知识的新旧混杂状况。5、留学国外或有海外进修经历的中青年人类学者，带进来了一些新的前沿理论和理念。6、社会—人文科学的其他诸多领域对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知识的渴求及试用，即人类学知识在整个知识界一定程度的普及，也应是中国人人类学逐渐成长的重要侧面。当然，还可列举很多，例如专业教育的成长（民族学专业和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点等）；再如于“中国民俗学”的知识传统中事实上存在的与人类学的学术性关联，它所积累的成绩及其潜力等。

在这些不同路径之间，虽然存在着彼此间的影响和互动，在一定的情形或场景下，不同路径的跋涉者也可能互认为“同行”，但多数场合下都是在各自的知识传统或“学科”中有意无意地建构各自感到惬意的学术空间和话语体系。我认为比起学科来，把此种状况理解为不同的学术“知识传统”的并存似乎更为恰当。那么，我们是否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不断地

